

## 试谈“五四”精神与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 THE SPIRI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THE INDEPENDENT CHARACTER OF INTELLECTUALS

袁 明

“五四”时代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它摆脱了文化上的沉闷与窒息，使一代精英敢于思考，勇于否定，直面人生，开创未来。深思与呐喊，否定与创新，立足于“黄土地”张开双臂迎接“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到来，这是“五四”精神的主流。在“五四”传统中，最耀眼的闪光点之一就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气质。

从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角度来看，“五四”精神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匠、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的精神相承，只是历史安排它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发生。“五四”时代最响亮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然而在提出这口号时所需要的眼光、勇气和胆识则是“五四”精英们留给后辈的最珍贵的财富。从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来看，如果没有一大批知识精英，没有知识精英们的独立的精神气质以及他们在各自领域中开创的知识天地，没有精英们对自然、社会表现出来的深度兴趣与关切，现代化的社会便无从谈起。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改

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对这一点已作了公正的评价：“学者、作家、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对世界的前途、人的使命、人的潜力的关注和担心，他们的道德力量，他们为还不符合人的生存条件的一切而感到的痛苦，都是十分真诚的，而且具有专家的权威性。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财富。在我们的时代，科学、知识在探索大自然和生命的奥秘，实际上决定着历史的运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样全面、深刻地肯定知识精英的作用与影响，至少在理论上是一个新的突破，新的起点。

知识精英的独立精神风貌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就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气质而言，“五四”精英们的觉醒、呐喊、言论所反映的是一种对旧传统的否定与批判，而不是维护与继承。中国历代知识阶层（余英时先生称其为“士”）的最高思想行为准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唯独缺乏的是一种对客观事实与真理的独立追求的精神品格。当然，这与中国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水平以及随之形成的“超稳定”生产关系密切相关。“五四”精神正是要否定这种“修、齐、治、平”的旧传统，代之以“民主”与“科学”。“五四”的启蒙作用有两重意义，一是知识结构上的启蒙，一是精神风貌上的启蒙，后者是前者的支柱，而在一定意义上说，后者的形成与发扬光大比前者要更为艰难。

中国的近代历史告诉我们，这种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风貌与品格从孕育到出土成幼芽经历了几代思想家（他们之中多数仍处于“士”的地位）酝酿与思考，探索与碰壁。应当作为社会先知先觉的知识精英的独立思考精神，在中国的发展的确是步履维艰。皇权的威严与限制、由小农经济所造成的对世事漠不关心、基本上乐天安命的芸芸众生窒息着，压抑着任何有创见、有洞察力的少数精英。清朝嘉庆年间，龚自珍极度悲愤地描绘了一个“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的败落时代，发出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的呼

喊。同治年间，李鸿章以独到的深邃目光与洞察提出中国面临的严峻局势“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面临的挑战“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并且指出，“外患之来，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以古方，诚未见其效”。然而，皇权赫赫，众生芸芸，他们的独立呼喊与见识不可能形成一个强大的舆论力量，被当权者和社会所接受。只有在多次败于先进的西方，甚至败于新起的日本之后，世人才有所觉醒。所以说，“五四”精英们发出的反传统的呐喊，是在几代思想家主观上希求中国强盛而在客观上一次次惨败后的总爆发。

“五四”精神的意义是划时代的，对于这一点似乎已没有多少争议了。但是“五四”的传统、尤其是知识精英独立的精神风貌究竟发展得如何，还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五四”时代的灿烂群星，今天已大多陨落，他们对中国社会民主化与科学化所做出的历史贡献长存，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五四”以来的70年中，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有没有形成一个独立思考的健全品格？知识精英的思考，有没有真正形成“专家的权威性”？看来，以上这些仍然是很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大课题。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解决以上这些问题中所面对的困难与所走过的弯路。首先应当认识中国知识分子在培育这种群体的品格与独立的人格上的“先天不足”之处。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影响熏陶已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某些固有的属性。从历史上看，他们要就是以封建士大夫的身份依附于统治者，或是在失意之后，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的遁世生活。无论是为官还是为民，他们形不成一种独立的群体力量与品格，只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忧”字概括一切，但只代表心态，不说明思想，这是很具有悲剧色彩的。这种传统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心理基础。鲁迅曾毫不留情地将这种心态批评为“爱国的自大”，即揭开了这种心态的自我满足而缺乏真正社会效益意识的虚浮之处。当然，不应当将这种心理基础的形成归咎于知识阶层本身，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客观历史环境中作更广泛的考察。但是，对这些主观客观因素的清醒认识，对母体文化所给予的种种天然禀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应当有清醒冷静的认识，不然就很难自觉地克服那植根很深，很隐蔽但又是致命的弱点。

对受到近代、现代西方文明（尤其是哲学与科学技术）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要注意的还不仅仅是上述的先天不足，还有中西文化迎头相撞接触之后带来的另一种心理矛盾，那就如美国学者勒文森所指出的“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感情上的认同与对西方观念的理性上的向往”之间的矛盾。这是历史与现实给中国知识分子所造成的沉重的精神负荷。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很难从这种沉重的精神负荷下完全超脱的。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以王国维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徘徊彷徨的矛盾心理为例，对这种现象作了精辟的分析：“这是一种痛苦的承认：一方面是过去的文化，它有丰富多彩的历史，富有哲理，具有美感，令人回味，然而不能适应‘救国’的当务之急；另一方面是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它对于中国的富强

十分必要，但却引不起人们心灵上的共鸣与感情的激动。这种状态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处在情绪沮丧并且难以在学术上完善的状态之中”。当然，目前很难有医治中国知识分子这种心灵创伤的灵丹妙方，但是，从近几十年来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演进上来看，摆脱这种沉重精神负荷的唯一出路是让理性来支配自我。

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之难以形成，除了母体文化的影响之外，近代以来还有各种政治浪潮的冲击。“五四”开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之风，但紧接而至的军阀混战、日本侵华战争、内战以及各种各样的政治动乱使中国知识分子难得有一刻宁静思考的机会。他们的言行均与政治息息相关。这是一个特定的时代给中国知识分子打下的烙印。这种悲剧进程发展到“文革”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知识分子自我否定还过犹不及，何谈独立的品格与风骨？当然最后要在心灵中留一块净土的知识分子是有的，如党内有“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邓拓；党外有傅雷那样的学者，他们以死抗争，以示清白。但如果中国知识分子从开始就形成主导社会思潮的群体力量，有独立思考的传统，“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康德对启蒙运动的评语），“文革”这样一场全民族的浩劫与悲剧就不应当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出现。十年浩劫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极为沉重的自卑心理是难以估量的。不难理解，当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际，邓小平同志说“为了发展教育科学事业，我愿当你们的后勤部长”时，对饱受磨难与创伤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真

如闻隔世之音。当然，中国知识分子痛定思痛，需要深沉的思考，更需要从全中华民族付出惨重代价的历史上这沉重的一页中汲取教训。教训之一就是“五四”所开的启蒙觉醒之风，由于外界的种种干扰，没有真正发扬光大起来，而这种独立思考精神的萎缩阻碍了全民族的现代化进程。这一点应当成为长鸣的警钟。

50年前，在延安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提出首先觉悟的知识分子应当愿意并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论断。由于封建等级制度的残酷，列强的入侵，中国的民众，尤其是工农大众极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更谈不上教育的普及，而这种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的低下无疑沉重地拖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步伐。到工农民众中去，做大众普及教育工作，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其次，知识分子是属于全社会的，他们应当代表社会的良知。而要做良知的代表，首先应当了解社会，了解占社会绝大部分的民众的精神、思想、文化状况，了解社会与民众的需求以及满足这种需求所应当做的努力。当时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挑起了唤起民众、教育民众的重任，在为抗击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对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还有另一种机械的形式上的理解和搬用。这种现象的后果是盲目地否定知识的作用和力量，盲目地夸大民众的水平。更具悲剧色彩的是，在这种盲目的否定与夸大中都有知识分子自身的参与，而其最后的恶果便是在“文革”中出现的荒谬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以及其载体的

地位的低下反映了全社会的无知与病态。这种现象是对“五四”精神的根本反动。

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运用科学知识进行创造性的独立思考，并将这种思考的成果贡献给社会与全人类。“科学立国”、“教育立国”已是当今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成功经验之谈。在这种基本国策指导下，知识分子的独立创见受到鼓励，得到嘉奖，知识分子群体的独立品格也随之定型成熟。这几年来笔者曾到欧美日本等国参加多次学术会议，对这一点感触尤深。中国的文化界有一句老话叫做“文责自负”，但外部各种政治冲击以及内在个性的软弱使这一“文责自负”的勇气有减无增，公开发表一些言论往往要再三推敲其“政治风险”，其结果就是作品无棱无角，无独立的创见可言。笔者的专业是国际关系，仅以这一研究领域为例，许多发达国家中的学者已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言论阵地，如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广招贤才，兼容并包，让学者们的各种意见得到充分的阐述。在这样的环境中，知识精英的创造性的独立思考得到保护，又能付诸于政策设计的实践，一个良性循环便由此形成。以上是一些客观条件较好的情况，也有在客观条件很差的情况下知识精英仍坚持独立思考的例子，例如二次大战之后的日本。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之后，又开始了麦克阿瑟占领时期。当时美国对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控制，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影响也并未完全消失。在各种压力之下，日本学界还是出现了一批“和平”学派的代

表。战后几十年来，他们不计个人荣辱、毁誉与地位升贬，为维护自己的信仰与学术思想奔走呼吁，不断发出日本应当对以往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作深入反省的警告，赢得了日本国内进步势力及国际同行的支持与尊敬。这种精神风骨以及学术思想是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充分展现。我们今天谈发扬“五四”传统，应当在世界范围内考察知识分子运动并做必要的精神借鉴。

十年以前，我们纪念了“五四”运动60周年。当时正是十年浩劫结束，科学大会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中国知识界带来新的希望之际。自那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蓄之已久的创造力如火山岩浆一般迸发出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近年来出现的“文化热”，都已超出了理论文化界的圈子，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关注与参与。虽然十年来走过的不是一条坦途，但毕竟可以说是“五四”精神的继续。近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社会与思想界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历史潮流。在回顾这十年的历程时，我们更应当为“民主”，为“科学”，为知识分子群体的独立思考精神的发扬大声疾呼。因为那才是改革成功的希望所在，是出现一大批有别于传统的“士”而有现代意识、科学理性观念与管理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希望所在，是我们中华民族得以振兴并对全人类做出贡献的希望所在。

本文作者袁明(Yuan Ming)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